

## 论明末常熟县“勒石治理”的实践及影响

——以三通垦荒碑为中心

刘伟杰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万历四十六年(1618),苏州府常熟县奉院道府命令在衙门前先后颁立了三通垦荒碑。三碑不仅是异乡垦荒民越级呈告争取到的权益凭证,也反映出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互动形式的变化。同时作为垦荒政策公示的载体,勒石立碑也被视作一种规则建立方式,被辐射到相似状况的周边地区,引领新一轮的秩序更新。在此类碑石频立的背后,是地方官民对于“勒石治理”模式的共同认可,这种信任基础并非朝夕形成,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切磋协商,并经由实践反复检验所得出的较优解。

**【关键词】**公文碑;明代;垦荒;常熟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1-0120-12

## The Practice and Influence of "Monumentalize Governance" in Changshu Coun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entering on Three Steles of Land Reclamation

LIU Wei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 1618, Changshu County in Suzhou Prefecture constructed three land reclamation steles in front of the county office by order of the local higher authorities. The three steles were not only the vouchers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land reclamation, but also 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the for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s a vehicle for publicizing land resettlement policies, the erection of these steles was also seen as a way of establishing rules, which were radiated to neighboring areas in similar conditions, leading to a new round of order renewal. Behind the frequent erection of such steles was the common recogni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citizens of the "monumentalize governance" model, a foundation of trust that was not formed overnight, but rather a better solution arrived at through repeated consultations over time and tested by practice.

**Key words:** official document stele; Ming Dynasty; land reclamation; Changshu County

明清时期,地方官府通过公文立碑的形式发布政令成为普遍现象,以县衙主持勒石最为常见。碑刻所载政策明文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问题与官府的应对方式。同时,碑刻保留的公文体式也直观

[收稿日期] 2024-04-23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借鉴”(LSYZD21006)

[作者简介] 刘伟杰(1995-),女,法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代公文制度、明代法律史。

呈现着政策制定的具体程序,不仅有地方百姓的权益诉呈,也有抚按道府等上级衙门的决策批详。从既有成果来看,以往研究注重碑石所载禁约管治<sup>①</sup>、水利纠纷<sup>②</sup>、乡约组织<sup>③</sup>、工商会馆<sup>④</sup>等内容,通过提取地方官府采用的政策明文,用以探讨国家制度或民间规约的实施效果。然由碑文程序所见,在诸多碑石得以颁立的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官民在争端中不断地博弈与磨合。

明万历年间,围绕客民垦荒纠纷,江南地区的嘉定、常熟等县相继勒石仪门,将政策内容及制定经过公之于众,其中碑文所载“异乡甲”,这种为垦荒而临时设置的非常规的赋役区划编制,成为明末江南地区处理土地积荒问题的有效缓解措施<sup>⑤</sup>。但从立碑过程来看,异乡甲制度能够大范围推广,不仅是各州县在制度改革上的相互效仿,更离不开垦荒者的主动参与。因此不同于静态的制度史梳理,本文将以常熟县三通垦荒碑为中心,通过着重关注碑石刻立背后的动态行政过程,探究垦荒者与地方各级官府各自的行为目的与方式,进而论证“勒石治理”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所产生的效果与影响。

## 一、垦荒碑的刻立始末

常熟,吴之北境也。境内水网交织,“郡国之渐水者,吴为首。吴之水,莫大于常熟。有江以环于此,有海以滨于东,两湖并汇,百川交贯。邑之地,水与陆恒半”<sup>⑥</sup>。在提供丰沛灌溉水源的同时,地处吴江下游的常熟县也时常受到泛滥水患的威胁。万历三十二年(1604),耿橘就任常熟知县,大兴水利工程,期间相关公文行移被整理出版为《常熟县水利全书》。而在此书中,除了各类治水公牍外,还附有《开荒申》《覆详开荒申》两件公文,均是耿橘为改善当地积荒问题而向上级官府呈送的报告。他在文中指出:

本县坐滨江海,田地高下不齐,肥瘠参半,兼以赋役繁重,民生游惰,以故田多荒芜,萧条满野。然非土性之荒也,亦非一荒不可复熟也。水利未修,旱涝无备,荒者且岁有益焉,则熟之难。流移未还,劳来未至,则熟之难。积逋未豁,原主告争,民虽有欲垦之心,鲜不蛇豕视之,则熟之难。风俗颓败,邪行交作,民不务本,则熟之难。<sup>⑦</sup>

① 代表性成果包括童旭、丁亚兰:《论清代徽州禁约合同——兼议与禁约告示、禁约碑之区别》,《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李雪梅:《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中华书局,2015年;魏晓锴、王建云:《清代禁约与地方社会——以山西高平禁约碑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

② 代表性成果包括李麒:《观念、制度与技术:从水案透视清代地方司法——以山西河东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张朝阳:《公众权益与17-18世纪江南官河、官湖纠纷》,《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金安平、王格非:《水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共治”——以明清水利碑刻为观察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③ 代表性成果包括张翔凤:《近代苏州碑刻中的乡绅自治与宗族保障》,《史林》2003年第4期;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罗桂林:《在“奉宪示禁”与“闾乡公约”之间——明清福建同安县规约碑中的社会秩序》,《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④ 代表性成果包括李雪梅:《工商行业规范与清代非正式法——以会馆碑刻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彭南生:《晚清地方官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理——以近代江南地区的碑刻资料为分析基础》,《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黄敬斌:《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⑤ 谢湜:《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载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4-279页。

⑥ [明]邓綬:《嘉靖《常熟县志》卷一《水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54页。

⑦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开荒附》,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27a-31b页。

总结来说,常熟县的积荒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在自然方面,“田地高下不齐”是因常熟县地处太湖平原边缘沙冈地带,随着泥沙沉积与滨岸滩脊的形成,洼地周边区域得以加宽加厚,由此形成该流域的高低之别<sup>①</sup>。经耿橘实地查勘,将常熟县的正西、西北、正北、东北划为高地,而正东、东南、正南、西南则是低田<sup>②</sup>。高低田肥瘠之差,使得大片低区积水地沦为坍江荒田,无法耕种。另外,如耿橘所说“非一荒不可复熟也”,导致当地荒田长存的另一原因则是明代江南的税粮逋负。早在宣德时期,应天巡抚周忱直言:“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sup>③</sup>虽然历任官府屡有招抚垦荒的政策,但垦荒民还是会面临水利工程无法保障、原主争夺复熟田产权等问题,一旦垦荒免税时限到来,田地再度被抛荒以逃避赋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sup>④</sup>。

针对以上情况,耿橘在报告中相应提出十二条垦荒政策。他认为,首要任务便是招抚流移人口,迁徙百姓是受到钱粮重、差役繁、水旱无救的三重压力,不得已才背井离乡。除了要求宗族、亲戚、里排、公正人等转相布告,招致归耕外,在政策上颁给逃民帖文执照,明确免征名下荒田的以往税粮,今后按照开荒事例“三年半税,五年全科”执行<sup>⑤</sup>。再者,考虑到告垦之民多是孱弱可矜,通过酌给牛种、矜免杂差、禁绝豪强兼并等条款保障垦荒民的基本权益,同样是以明给帖文的方式,列明免差范围、告垦地段、税期的具体内容,并允许垦荒民执帖为凭,赴县陈告以重究豪强兼并之徒<sup>⑥</sup>。最后,耿橘强制驱使恶少打行、赌博游手、贩盐无籍、讼师扛棍等群体参与垦荒,具体做法是在法定刑罚执行后,将相关人等交由各区公正大户收管,每季终赴县递交“改行从善结状”,并随乡约会听讲<sup>⑦</sup>。在后续《覆详开荒申》中,耿橘进一步提出半税入仓备赈、全科米入会计减荒增熟、新熟抵补新荒及减旧荒等税则措施,其策略主要是通过以复熟米削减荒田田则,减少优免期过后垦荒民的流失,有利于保障开荒政策的持续稳定<sup>⑧</sup>。耿橘的两次申议先后呈报至苏州府、苏松道、常镇道、巡盐御史、巡按御史处,均得到了批准。

开垦政策的推行不仅提高了当地土民参与开垦的积极性,同时也招徕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的垦荒客民,但异乡垦荒民与当地土豪、荒田原户之间也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产权纷争。万历四十六年(1618),常熟知县张节先后将三件与异乡垦荒相关的公文铭刻于石,立在县衙前。据方志记载:“开垦荒田禁止阻夺碑,三石,文述通详抚院等奉府批:一准崇明人沈柏等开垦荒田四千余亩,成熟升粮,不许土豪大户阻夺;一准通州人顾华等开荒田六千余亩,并禁攘夺。后附排甲姓名;一准异籍毛振等开垦荒田四千余亩,十年起粮并不准原户阻夺。”<sup>⑨</sup>三碑均以常熟县作为公文发布主体,透过碑刻所载公文流转关系,可以将垦荒碑的刻立始末逐一还原。

表1 万历四十六年常熟县三通垦荒碑文<sup>⑩</sup>

	开垦荒田碑之一	开垦荒田碑之二	开垦荒田碑之三
刻立时间	万历四十六年九月	万历四十六年重冬	万历四十六年孟冬
事件起因	开垦荒田民沈柏等呈	异乡甲民顾华等连名呈	异乡民毛振等连名呈

① 李兵兵:《明代常熟水利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26-27页。

②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第24b页。

③ [明]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页。

④ 参见谢湜:《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载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4-279页。

⑤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开荒附》,第28a页。

⑥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开荒附》,第28a页。

⑦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开荒附》,第28b-31a页。

⑧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卷下《覆详开荒申》,第62b-64a页。

⑨ 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校:《重修常昭合志》(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28页。

⑩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61-568页。



续表1

公文标题	常熟县为遵宪复熟升粮，裕国抚民，以溥德政事	常熟县为恳恩照例，请明立石，以垂永久，以杜争端事	常熟县为恳恩申明宪禁，永照宪规一例，抚仰刊碑，免使民散田荒，以累民生国计事
具体诉求	恳天批该县查勘给帖，悉县奏准事例，如嘉定县事理，编立异乡甲分，土客各不相关，立石遵守，永为世业，庶豪强不得阻挠，差役不得暗陷，德政永垂等情。	切今爷台朝天在即，非奉赐请禁戢异日以遭苦害，使华等远民全家老幼，永□其处。有幸德意，悉上海、昆山、嘉定等县备请蠲差立石遵守等情。	望乞恩行县查照嘉定事例，一一遵照施行，尽将客民之田，另立异乡图甲。仍立公正、图书各一名，永照相比。自办□规升粮，务照宪限年例，概免重差定额公租，一体勒石垂禁等情。
处理结果	适柏等稽首，请以异乡甲，树碑以志不朽，庶几镂骨铭心。匪徒铺张粉饰，世世长为常熟编氓，毋相渎□，则守兹土者，不借有光宠乎。遂命之从故事勒石云。	奉此，合就立石禁戢。为此，示谕异乡氓□等，即便（下缺）各守遵。（下缺）扰害者。定绳□尺，决不尔贷，永永恪遵。须至立碑者。	今已申明道府，依嘉定、昆、青事例，一体优恤。另编异乡图甲，其起科照十年为始，永议折银，勒石垂久。

据第一通碑文所载，此事缘起于崇明县沈柏等人直接向苏州府呈报词状，声称是遵奉国家招民垦荒政策，意欲前往常熟县严昌、羊庄等圩开垦板荒田五千余亩。惟恐土豪阻挠，请求苏州府行文常熟县，指令其查勘地界，出具帖文执照，并“如嘉定县事理，编立异乡甲分，土客各不相关，立石遵守”。据此，苏州府同意沈柏等人“愿守恒业”的想法，并于二月初十日批令常熟县查报此事。常熟县经查证发现，在此前也曾接收过沈柏等人的垦荒呈状，并已经在同月初四日准许其开垦请求。但为落实异乡甲事项，常熟县仍指令典史朱思孝前往严昌等圩查勘，编立十甲里排，收户粮役<sup>①</sup>。但在申详院道时，常熟知县又虑及“惟是远人易合亦易离，意气锐进亦易退”，仍将本地土民列为日后垦荒优先考虑对象。若有剩余荒田，则交由异乡民领种，“合照嘉定事例，编定异乡甲分，勒石优恤，务使人为编氓，田为恒产，阻挠兼并之弊，一并杜绝。”之后苏州府、苏松兵备道、应天巡抚在批复时，均认可常熟县“先尽土著认垦”的处理意见，同时也强调“编甲、纳粮、勒石等项，俱照嘉定事例。”<sup>②</sup>最后常熟县通过查照嘉定碑文，对沈柏等人的异乡甲身份与权益予以明确。

在第二通碑中，呈告者顾华等人已经具备了异乡甲身份，同样是奉谕招抚，在常熟县西北一带开辟荒田六千余亩，且均按时依照垦荒斗则纳粮，有比册官票为证。但因该田原系人为避税抛荒，现见荒田垦熟，原田主便设谋兼并，“轻则报役陷害，重则挟势鲸吞”。据呈词所见，顾华等人可能已经受到威胁或产生实际损害，但所幸“天台仁政，彼恶屏息”。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于是顾华等人向常熟县提出“悉上海、昆山、嘉定等县备请蠲差立石遵守”的请求。因后部碑文漫漶，后续程序无法完全复原，但仍可见应天巡抚对常熟县申请的批示：“既经复准其立石，业办粮以垂永久。如有原主混争，严加究治。”苏松兵备道同样批复“立石勒碑，永永遵守”，苏州府要求“照昆嘉之例”“立石以垂永久”<sup>③</sup>。据此，常熟县最终“立石禁戢”，示谕诸人毋得扰害。

第三通碑的刻立时间最晚，但其行文时间可能是三碑中最早的。首先，该文由异乡民毛振等人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十六日具呈，但在第一通碑中，毛振是以区书身份与县官同列结尾落款处，且沈柏人等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二月才前往常熟申请开垦荒田，由此可知，毛振等人应属于较早一批前来常熟开垦荒田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充当了后迁入的垦荒业户的“中介”，也是官府征收复熟荒田赋税的“中介”<sup>④</sup>。再者，毛振等人的呈请理由是常熟知县在万历四十五年出台了新的招抚政策，出于“若不宽

①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1页。  
②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3页。  
③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5页。  
④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94页。

恤已来,恐阻未来”的考虑,毛振等人希望常熟县对其已垦熟的四千余亩沙田予以保障,即参照“嘉定事例”,另立异乡图甲,仍立公正、图书各一名,永照相比<sup>①</sup>。因碑文漫漶,部分文书关系不得而知,但从后文“仰常熟县查报”推断,毛振等人可能同样是直接诉于上司或监司。又据知县张节结语“今已申明道府,依嘉定事例一体优恤”所见,此事确实经由道府审批程序,决议为异乡垦荒民编定异乡图甲,“其起科照十年为始,永议折银,勒石垂久。”<sup>②</sup>

基于对三通碑文的整理,按时间顺序可以大致总结异乡垦荒民在常熟县的活动。首先,三碑主人公在呈文中均强调“奉谕招抚”的前提,故常熟县及其上级官府应先发布招募垦荒的文告,在第三通碑中便抄录了常熟知县张节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发布的垦荒告示<sup>③</sup>。当垦荒者选定某处田亩地段,则需呈报当地官府对该田四至边界、田亩科则进行审查,若符合荒田要求,则由当地官府出具垦荒帖文,用以证明产权关系及免税年限。其次,在嘉定等县编定异乡甲的影响下,毛振等人因“挟资本无惜,竭胥胥无惮,相当浚淤,开垦沙田四千余亩”,率先请求常熟县为垦荒客民编定异乡甲,并明确十年为始起科,永议折银<sup>④</sup>。此后,当沈柏等人前来申请垦荒编甲时,对十年之外的科粮斗则进一步明确;顾华等人则是为对抗当地土民豪强的肆意阻挠,意欲效仿嘉定等处立石之举,再次明确异乡甲的权益。总结来说,三通石碑均是由垦荒异乡民的连名呈请引起,都希望官府能够援引“嘉定事例”,通过编定异乡甲、勒石禁戢等方式,改善身为客民在常熟县面临的艰难处境。

从结果来看,垦荒民的诉求得到了满足,碑石也最终得以刻立。在这背后不仅是常熟县官与异乡民之间的协商,还涉及更高级别的行政审批。在第一通碑中,常熟县虽然能够直接授予沈柏等人在当地的垦荒资格,但对于能否参照“嘉定事例”编定异乡甲,还需逐级向苏州府、苏松兵备道、应天巡抚申详。同样在第二通碑中,即便顾华等人“蠲差立石”的请求只向常熟县提出,但常熟县还是需要申详府道院,得到准令后方可落实。这套流程与江南地区钱粮管理机制密切相关。明代江南田赋居全国之首,为解决逋赋问题,自宣德五年(1430)由应天巡抚总理苏松等府税粮<sup>⑤</sup>。此后随着巡抚职能范围不断扩充,兼管农桑、水利、司法、民政等项,无暇专顾税粮征解,于是根据因时因地需要,苏松兵备道也会兼管粮储水利<sup>⑥</sup>。而异乡甲的编定涉及地方赋役编审与征收制度,因此在三碑中,应天巡抚、苏松兵备道以及苏州知府的批示作为常熟县执行政策的实际依据,显得尤为重要。垦荒三碑均保留较为完整的公文行移结构,府道院官衔的固定格式突出了高级别府衙的参与决策,三碑最后也有常熟知县张节领衔的官吏列名,包括县丞、主簿、典史、公正、区书,以此体现碑文的权威性。此外在各碑正文结尾处,常熟知县张节还附有看语,除了重申政策扶持,尽显常熟官府对荷耨远人的招徕诚意,还反复劝勉垦荒者坚持勤恳劳作,“既安为已业,不惮胥胥,俾一时之劳,阶百世之利”<sup>⑦</sup>。对常熟县而言,勒碑仪门不但能够落实上级指令与回应民众诉求,也是宣扬教化与彰显作为的直观方式。

①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7页。

②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8页。

③ 据常熟县案查得:“本县正堂张于四十五年先经出示为申飭招抚事宜,以修荒政,以俾实效事。照得招抚流移,开垦荒田,备载宪纲条约,又奉部院题入保民实政□□也。特此(下缺)有司急务也。本县视事半年,专以区书劳役,心力未□修举招垦三事。倘遇考成,奚以塞责。拟合出示奉行。为此示仰通县公正里排乡耆人等知悉,凡有区图人民,因凶岁流移,或逋赋远遁,照□□籍□生,可资无田可科者,计□多□慰谕赴县告明。附近可耕荒田,官给耕种,听开垦成熟,照例年满科税。即有旧逋,悉与宽免。更有区图新荒田亩,或有军民人等,愿有承种者,亦许听明给帖,听其尽力番耕。”参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7页。

④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6页。

⑤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宣德五年九月丙午条,第1640页。

⑥ 胡克诚:《明代苏松督粮道制考略》,中国明史学会主办:《明史研究》第十四辑,黄山书社,2014年,第20-24页。

⑦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3页。

## 二、“嘉定事例”的示范作用

在常熟县的三通垦荒碑中,异乡垦荒民在向地方官府主张权益时,尽管诉求内容有所不同,但无一不将“嘉定事例”作为援引依据。明代嘉定县同样隶属于苏州府,面临人口逃亡、逋负严重的问题,嘉定县在优化赋役制度的同时,率先着力招徕外来垦荒者以补足税额,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方针成为区域性示范典型。“嘉定事例”的重点内容在于对垦荒客民的优恤,包括延迟起科年限、免除一应徭役、固定起征科则等等,相关政策的内容及制定过程均在碑刻中得以详细记载。

### (一)事例的形成及内容

常熟垦荒碑有关“嘉定事例”的具体内容,只有在第一通中以“细查嘉定碑文”的形式抄录了一部分,第二、三通碑则仅见官民双方在不断强调“异乡甲”“勒石”以此作为“事例”提炼出的关键词。关于常熟县节录的“嘉定碑文”,主要是从嘉定两通公文碑中提取的政策信息,也是嘉定县衙对两次垦荒纠纷的处理结果。第一次是指万历时期通州民倪谦等呈“为大造异乡民命事”,抄录碑文仅保留嘉定知县王福征的查议内容,未涉及该案的全过程。所幸清顺治三年(1646)嘉定县《垦荒斗则碑》对此事有更加详细地回溯:

前朝万历初年,因漕兑为累,民多弃产逃亡,田荒粮缺。而下区低洼之乡为尤甚,积逋不可胜计。彼时前县王、韩诸令相继招徕,召民开垦,宽其赋役,于是有通州等地业流民倪谦、陈鸿等负米来归,穴居草莽,东则垦四、五、二十四等都,西则垦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一等都。或浮沙瘠土,或低下荒区,为土著所弃而不耕者,若辈不辞劳苦,渐垦渐熟,开嘉定之旷土,补通邑之荒粮,实与有力焉。嗣后得题永折,逃窜之民,渐次归来,复争故业。所以前县申蒙抚、按诸台,定土客年限。又验地之肥瘠,以定税之高下。而异乡之民,犹免一应差徭,勒石以垂永遵。前贤之抚恤流民,其详且尽。后历三十余年,相沿无改。<sup>①</sup>

据此可知,倪谦等人的状告大抵是受万历二十一年(1593)嘉定“漕粮永折”<sup>②</sup>政策的影响,原来弃产逃亡的田主渐次归来,与垦荒客民出现产权纷争。对此,嘉定知县王福征明确表示:(异乡垦荒民)“原无亲属,地民易至欺凌。比之本地居民,孤苦不同。均议十年之外起科,仍免一应差徭。”<sup>③</sup>据常熟县抄录的“嘉定碑文”记载,该提议最后经由苏州知府孙成秦、苏松兵备道查某、南直隶巡按秦某及应天巡抚赵可怀各详批允,并“勒石以垂永遵”。因此碑已经佚失,仅据官员任职时间推测,行文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六年(1598)之间<sup>④</sup>。除了反映异乡垦荒民的孤苦境遇,此碑记录了嘉定县对待异乡垦荒民的较早政策,“十年之外起科”“免一应差徭”也成为“嘉定事例”的基本原则。

第二次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开垦荒民黄良等人的呈告。关于此事,有原碑留存于世,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嘉定县所立《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碑》。在该事件中,黄良等人同样选择越过嘉定县,直接将呈状递交至监察御史处。据呈状称,黄良等人奉示招徕开垦,田亩连年已获丰收,不料近期遭遇水患。在此情形下,嘉定县不仅违背垦荒“十年免科”政策,还要对荒田所在西乡贫瘠之地收取与东

①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2页。

② 现存《永折漕粮碑记》《嘉定县记永折漕粮奏疏并勒石缘由》《永折漕粮碑记》《嘉定县改折漕粮本末》《漕粮永折为百世利宜久远之碑》《折漕报功祠碑记》均与此事相关,详见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3-114、125-139页;相关研究参见吴滔:《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③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2页。

④ 赵可怀,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应天巡抚;孙成秦,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任苏州府知府。王福征,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嘉定县知县。



乡肥田的同等科则。同一时间,苏松兵备道也接到来自下区垦荒业户顾仁等为“垦定粮额”的连名呈告。嘉定县根据两司批示进行查勘,首先,垦熟田提前升科的原因解释是“宗人府用钱不容迟缓”;至于不同地段田亩的升科幅度,县司认为需要实地详勘地亩后,再相应拟定科则标准:“欲现科二斗者,不减不增,其余低洼之乡,姑无拘于一斗一升之例,应增者不得加少,应减者不得加多。”<sup>①</sup>经上司批详,嘉定县最终将十年升科的标准落实到具体地块,并彻底固定科则,不再继续升高<sup>②</sup>。而这也成为常熟垦荒民呈请中援引“嘉定事例”的核心所在。所以在常熟县的第一通垦荒碑中,基于上述“嘉定事例”的规定,再结合对沈柏等人垦荒所载二十四、四十都田土查勘结果,认定两处都属于极低深水处,明确沈柏等人垦荒地亩“原额三斗二升者,减至二斗五升;原额二斗五升者,减至一斗九升”,最终“应照嘉定事例,俟至于十年之外,照依申允斗则科粮”<sup>③</sup>。

至于常熟三碑通篇提及的“异乡甲”一词,实际上并未出现在嘉定碑刻的正文中,而是在结尾点明“异乡甲”的身份,并条列公示详定永额斗则。尽管“异乡甲”的首创时间暂时无法考证,但其特点在碑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晰,“编户立甲,自催自纳,世免徭役”。官府通过这种方式,将外来垦荒业户的田地数据、粮税政策同当地土民区分开来,同时指令客民自行担任该甲区书、公正,以此避免土民联合吏书侵吞复熟田的不利局面。异乡甲的编定是垦荒异乡民主张权利的共同胜利,但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召募开垦,免其徭役,渐垦渐熟,上则不胜茧赋,下则屡受欺凌”<sup>④</sup>。仅就万历三十九年嘉定县立碑一事,便是垦荒民从万历三十五年(1607)开始“将酌定粮额等事,控之盐院韩、该署印同知吴,参酌众论,定为永额。”<sup>⑤</sup>历经四年有余,其中过程之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碑文的最后,除了县衙官员的列名,还誊录了参与呈告的诸位异乡业户姓名。从这个角度来看,嘉定垦荒碑不仅是地方官府进行土地开发与赋役改革的政策传播载体,也记录了异乡垦荒民为权利斗争的全过程,“碑石永垂”也寄托着异乡民对官府庇护其权益的美好愿望。

## (二)事例勒石的影响

相似的自然环境与税赋重压,对于苏州府所辖各县的垦荒民来说,面临着相同的难题。嘉定县的处理结果被刻立在嘉定县衙门口,但对当地无意参与垦荒的大多数百姓而言,并未产生冲击性的影响。这种立碑为照的举动,真正关照的是周边州县中具有相同艰难遭遇的垦荒客民群体,他们需要一种主张身份认同与权利保护的方式,而“嘉定事例”无疑提供了一种值得效仿的思路。

从常熟县民的呈告中可知,在当时上海、昆山、青浦等县也相继开始明确免税年限、细化科则标准以及编定异乡甲。并将相关情形俱“各勒碑仪门,永示遵守”<sup>⑥</sup>。崇祯《太仓县志》提到了太仓州编定异乡甲的情形:

异乡甲,非额设。盖缘二十六、七等区多无主荒田,于万历四十五等年,有沙民王升等具呈各宪,愿出工力开垦。本州知州赵赞化躬临勘确二千余亩,给以印帖,宽其升科年限。正粮之外,免其一应杂役,编为异乡甲,以示优恤。仍禁本籍土著,概不敢溷入滋弊。<sup>⑦</sup>

“事例”本义为发生过的事件、案件,在明清会典中,泛指各种因事而立,属于“可变通之法”“权益之法”性质的法令,则例、榜例也包括在内<sup>⑧</sup>。但从前述内容来看,“嘉定事例”尚未上升到地方规范层面,仅

①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36页。

②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第284页。

③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3页。

④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41页。

⑤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41页。

⑥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6页。

⑦ [明]钱肃乐、张采纂修:崇祯《太仓州志》卷八《赋役志·乡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十五年刻本,第70b-71a页。

⑧ 杨一凡:《论事例在完善明代典例法律体系中的功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是作为周边州县处理政务可参考的做法。或许这些可行的举动在垦荒民心中有着极重的分量,才会以“事例”称呼。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州县的垦荒异乡民除了要求在赋役内容上与嘉定县一致外,在维权方式上也着重强调“立石”的作用。因此作为垦荒民反复强调的形式诉求,官府勒石也应属于“嘉定事例”的组成内容。而将垦荒权益内容立石于官府仪门,原本是周边各州县援引“嘉定事例”的独立个案,但客观上却在太湖流域形成了以碑刻为主体的规则载体群,用以守护和捍卫在客乡耕种下区荒田者的权益与地位。从执行效果来看,由嘉定辐射至周边的“异乡甲分”也确实得到了相对长久地执行,“前贤之抚恤流民,其详且尽。后历三十余年,相沿无改”“异民所垦之田,原在下区,即以升抵减,轻重适得均乎。再勒碑文,重示遵守,又二十年所矣”<sup>①</sup>。

除了横向的空间传播,“嘉定事例”也在时间维度上延续到了清代。据顺治三年(1646)嘉定县《垦荒斗则碑》载,清初江南进行土地清丈,并严查欺隐轻粮的行径。有府县奸猾吏书借此名义,纠同差役玩法,将下区作上区苛计,并诬陷异乡甲民有欺隐钱粮的行为,以此敲诈肆扰。嘉定县东西两异乡甲十六、十七、十九都粮民陆荣等人不堪其扰,直接连名呈告至江宁巡抚土国宝处,请求“电瞩原勒碑文,并酌定田额,严行申飭”<sup>②</sup>。据此,嘉定县指令本都公正调取碑文查明,署县事苏州府推官认为,政策所言宪查弊隐只针对势豪侵占的情况,不应涉及下区流民定额的减免赋役。胥吏借端滋扰自应处罚,但下区流民的权益应“仍勒禁碑,庶旧德新恩共垂不朽矣”。经江宁巡抚土国宝批准,嘉定县勒石申禁以保护异乡甲民权益,明确“以后凡遇丈量编审,垂照宪立碑文,酌定斗则办粮,自催自纳,蠲免差徭。如有里胥作奸,指称加科派役,混行需扰者,许该粮里指名告理,定以违宪诬诈论罪不贷”<sup>③</sup>。

在明清更迭的大背景下,昔日“嘉定事例”在新朝继续发挥作用。垦荒民户虽以奸顽吏书玩法伤民为题,实际上是寄希望于清代政权能够重新认证前朝遗留的减粮免役政策,其意图在呈文结尾“乞电瞩原勒碑文并酌定田额”表达得十分明显。从决策过程来看,定额碑文的客观存在证明了异乡甲民优免政策的“合法性”,地方公正与署县推官在各自呈报中也反复强调前朝确有立碑优恤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江宁巡抚土国宝则是强调了情理层面的关照:“清查田亩原以剔兼气而厘隐占,何得苛求?垦荒区图,殊非新朝惠民本意。”<sup>④</sup>最终,由“旧德”引出“新恩”,嘉定县异乡甲民“自催自纳,蠲免差徭”的权益在清初也具备了合法性,“嘉定事例”中具备标志性的勒石之举也得以延续。

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常熟县所立《均画异乡田地一体当差均役碑》所见,在康熙年间均田均役改革活动开展之前,常熟县的异乡甲分同样维持了明代的制度实践,采取“分隶管辖”的方式,仍与当地土民分别管理<sup>⑤</sup>。然随着康熙年间江南地区均田均役的活动推行,常熟县内官儒、先贤、僧道与异乡甲作为特殊主体被列入讨论名单,最终由江宁巡抚、江南江宁承宣布政使司先后批示,明确上述群体均实行一体均田当差。碑文明确:

为此,示谕官儒、先贤、忠臣、僧道及十五都里书、粮户人等知悉,恪遵宪批事理:一应杂泛差役,与通邑一体均当。其异乡名色,永行革除。仍将西北区各图划定田地,照依字号界址,均任地方役务及销圩事宜,永远遵守,不得谗误。敢有故违宪令,仍希诡弊作奸,一经察出,定行严拿,解宪究惩,决不少贷。<sup>⑥</sup>

异乡甲作为一种特殊的垦荒赋役区划,源于嘉靖均田均役改革遗留的积荒问题,在万历中期赋役折

①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42页。

②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41页。

③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42-143页。

④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42页。

⑤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27-628页。

⑥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28页。



银化、以及田地税则调整的改革浪潮中应运而生,最后在康熙年间较为彻底的均田均役改革中被废除,前后存在了一个世纪<sup>①</sup>。对于这一群体,在地方志书中难寻只言片语,却在碑石中记录了权利主张的全过程,始于嘉定县垦荒业户的示范行为,后推广至环太湖流域的荒田区域,数通刻立其权益的碑石分别竖立各自县衙门前,成为事件的记录者,更是规范传承的引述者。百年之后,该项政策同样是以勒石晓谕的形式被宣告终结,异乡甲成为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垦荒历史的独特记忆。

### 三、“勒石治理”的内在逻辑

回顾垦荒碑的刻立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常熟县还是嘉定县,县衙在立石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执行者,而非真正的决策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呈告主体选择越过基层官府,直接控告至府、巡按御史,甚至是一方巡抚。这一举动导致的结果是,一旦呈告人立碑为证的诉求得到上级官府的同意,那么州县衙门的勒石活动不再是“民呈官批”的许可事项,而是作为强制执行的政务要求。在明中后期,由这三方主体共同完成立碑活动不在少数。本节将继续以明代常熟县立碑活动作为关注点<sup>②</sup>,对“勒石治理”背后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垦荒碑得以刻立的缘由。

要明确的是,在万历之前,由常熟县主导的立石活动主要集中在县学。常熟因“古吴国之虞乡,言游氏之故里”而闻名,杨荣、吴讷、李贤、徐有贞、杨一清等先后为该县庙学修葺作记,相关文章均以县衙名义刻石立于邑学<sup>③</sup>。此外,明代常熟县“登贤科、跻臬仕者,独盛于南畿诸郡”,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天顺四年(1460)、成化九年(1473)、弘治十年(1497)均有由知县、县丞、主簿等同立进士题名碑“将以耀前而劝后也。”<sup>④</sup>嘉靖时期,在任知县刘乾亨、王鈇、王叔果又相继为儒学书院修葺、义田等内容立碑作记,用以维护常熟文献之邦的美誉,以此实现“今院宇整整然列,诸士彬彬集矣,聿以无辱监司之委,以无惰崇贤劝学素志。”<sup>⑤</sup>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万历中后期,尽管为儒学撰文立碑的传统仍在延续,但从数量来看,县衙门前所立一系列关于赋税、漕务、工商事务的公文碑更占优势。随着常熟县令立石的重心由县学转移至县衙,碑石也开始突破以往纪事的常规功能,转而成为官民共同参与地方治理活动的重要表现方式。

表2 万历至崇祯时期常熟县衙立碑情况<sup>⑥</sup>

立碑时间	碑石名称	立石主体	立碑缘由
万历十六年	税粮会计由票长单式样碑	常熟县立	奉抚院示:将本县田地应办税粮银米数目,并原奉由票、长单立石刻碑遵守。
万历三十年	黄册亲供议	知县赵国琦立	常熟县为严核亲供,清查黄册事产丁粮,以厘积弊事。
万历三十八年	购置义田分贍北运差役碑	知县杨涟、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奉抚院宪牌:合本院贍赎所置田,每年除完粮外,余息分贍北运差役。置田完日,仍勒石立碑,竖之该县衙门内,永久遵行,不许湮灭。

①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第296页。

② 要说明的是,选择常熟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现存明代江南地区的公文碑中以常熟县数量最多,为分析明末公文碑集中刻立的起因提供足够线索;二是垦荒业户的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有别于工商业主,通过不同研究客体的对照,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官衙立碑的作用与意义。

③ 陈颖主编:《常熟儒学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9-73页。

④ 陈颖主编:《常熟儒学碑刻集》,第49页。

⑤ 陈颖主编:《常熟儒学碑刻集》,第127页。

⑥ 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校:《重修常昭合志》(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23-930页。

续表2

万历三十九年	清查差免田亩呈碑	知县杨涟撰	呈准抚院案,奉府帖开:抚院奏明吴中官甲之弊,户部议覆旨,由县筹议优免办法并附开先年编差田今次清出。
万历四十二年	严禁扛诬设呈碑	知县詹向善、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奉府帖:申详院道,严禁扛诬设呈,合备碑石刊刻前项帖开事宜,竖立县门,军民人等知悉,务要遵守安分。
万历四十二年	给办典铺供具示	知县詹向善、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本县典户连名呈告,据巡抚、兵备道批:仰常熟县查报。本县申详:一切借扰尽行裁革。仍勒石永遵。
万历四十四年	禁止木铺供给示	本府掌县事海防同知杨凤翥、县丞、主簿同立	本县杉木商铺户连名呈告,据巡抚、兵备道批:据议定价勒石。本县申详:着为定规,立石县门。
万历四十五年	关税禁约石刻	知县张节、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奉兵备道宪牌、巡抚批:仰行县勒石严禁,再犯者拿解正罪。本县拟合立碑,竖立于各通衢处所,永为遵守禁绝。
万历四十六年	开垦荒田碑(一)	知县张节、县丞、主簿、典史同立;原呈异乡民列名	本县开垦荒田异乡户连名呈告,奉巡抚、兵备道批:其编甲、纳粮、勒石等项,俱照嘉定事例。一准崇明人沈柏等开垦荒田四千余亩,成熟升粮,不许土豪大户阻夺;一准通州人顾华等开荒田六千余亩,并禁攘夺;一准异籍毛振等开垦荒田四千余亩,十年起粮并不准原户阻夺。
万历四十六年	开垦荒田碑(二)	知县张节、县丞、主簿、典史同立;原呈异乡民列名	
万历四十六年	开垦荒田碑(三)	知县张节、县丞、主簿、典史同立;原呈异乡民列名	
万历四十八年	查看学田碑	知县张节、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奉抚院飭理刑厅查明本学公田亩数,勒石备考,附列地址科则租额。
泰昌元年	严革漕白陋规帖	知县张节、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奉巡抚宪牌:令各州县将禁革各款陋规,镌刻石碑,竖立于兑粮水次,永远遵照。
天启三年	禁止铺户供给碑	知县宋贤、县丞、主簿、典史同立	本县铺户连名呈,据巡抚批:仰县立碑。又奉兵备道批:勒石永遵。
崇祯三年	邑侯京山杨公酌议漕政八款	知县杨鼎熙撰	本县伏乞照详批允所议八款,勒石垂久施行。按院批:即可垂之永久矣。后附通邑监生员公呈。
崇祯七年	禁革短价采买物借办官价名色示	掌县事管粮通判樊大羹、县丞、主簿;铺户列名	本县油麻杂货铺行户连名呈告,奉巡抚批:仰县将本院原行禁革铺行告示书册,令各铺自行立石遵守。

这一时期以常熟县名义发布的公文碑多数与经济主题相关,各类钱粮赋役的改革反映出当地经济活动十分活跃丰富。随着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应天巡抚、浙江巡按、苏松兵备道在地方行政环节中也开始扮演着重要的决策角色。在当地铺户、垦荒民等群体的共同参与下,“立碑”已然成为常熟县处理部分政务所需的主要环节。那么从行政流程程序的角度,可以将表2所列碑刻划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播方面,主要体现在巡抚通过向地方州县发出牌文,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政令立碑的任务,如万历十六年(1588)要求各县将原奉由票、长单刻碑遵守,又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购置义田分贍北运差役后,明令各县将此立碑竖之该县衙门内。而巡按与兵备道是在文书流转过程中,多以批示的形式对立碑活动作出具体指令,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垦荒田碑中多次出现的“奉批:相应悉照勒石,以广招徕”<sup>①</sup>。此外,县衙是否按时完成政令要求,本属官僚系统内部的监察活动,但也会受到来自民众的监督。崇祯七年(1634)禁革短价采买的碑文,原是时任南直隶巡按御史刊布“按吴十四款”的内容,按理本应通行辖下各县,但据常熟县油麻杂货铺行户向巡按呈告所言“何独常熟不遵”。至此该御史“将本院禁革铺行告示,拟合一并立石,永为遵守”<sup>②</sup>。而县衙也并非限于单向接收,除了会主动对县内事务勒石处理,也会将其拟定政见呈详抚按,如崇祯三年(1630)知县杨鼎熙将按院覆详

①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68页。

②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3-584页。

公文刻于“漕政八条”之后,以此达到“庶遵行有所凭借”的目的<sup>①</sup>。

其二,在自下而上的呈告维权方面,如表2所见,这一时期常熟县多项政策的出台是由当地民众越级呈告直接推动,而县官则被动成为立碑的执行人。除了垦荒业户外,明末常熟县多数呈告与铺户有关<sup>②</sup>。有研究认为,随着一条鞭法的改革,地方官府对铺户供应或买办行为失去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官府的实际需求不减反增,这种矛盾便是禁当行碑层出不穷的根源<sup>③</sup>。从诉求救济的方式来看,工商业者同样选择越级呈告,直接向应天巡抚、浙江巡按、苏松兵备道、苏州府等上级衙门反复申请“勒石永禁”,此举不仅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铺户当官问题的特殊性也将县官胥吏置于被监察的地位。同理,在嘉定县的垦荒碑文中,万历三十八年嘉定县的提前升科也是迫使垦荒民直接呈告至巡按御史处的直接原因。美国学者陆冬远(Richard Lufrano)关注到明末江南地区的勒石请求均来自非精英群体,他们自身缺乏资源与权力,为了不受权贵与奸商的控制,他们只得向地方官府“请愿”以获取支持和保护。而地方官府为了稳定税收与加强治理,也同意将立碑公示作为一种“非正式官僚策略”,增强官府在地方社会的震慑力<sup>④</sup>。百姓越诉固然可以解释为对上级权威的信赖,但更实际的解释恐怕是基于对地方势力的怀疑与抗争。

在此要讨论的是,这些非精英群体的“越级呈告”是否符合明代的法律规定。据《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sup>⑤</sup>因此民户若不经地方州县直接上诉,应被治以“越诉”罪。但同时明代国家也有明文规定,地方抚按衙门、布按二司及各道均可以接受民间词状,但对于一般案件不直接审理,而是将案件下批至州县<sup>⑥</sup>。据现存明代徽州诉讼文书来看,民户直接向巡抚、巡按及兵备道处告状者不在少数,且官府处理方式均是交由基层官府重新审理<sup>⑦</sup>。由此可见,尽管法律规定禁止百姓越诉,但在明代司法实践中,禁令难以彻底落实。此外,地方抚按、兵备道等官为了保障地方财政与治安稳定,对于这些非精英群体的“请愿”行为都会给予重视,督促州县立石不仅是回应请愿者的诉求,也是对抗地方利益集团的权力宣示。在这种情况下,受理官府一般不会追究群体性的越诉责任。

或因如此,在明末常熟县的官府立碑中,由抚按批示的公文才会越来越多。而支撑民众频繁上告的另一基础在于都宪行台与察院在县城的建置:前者是巡抚驻地,后者为巡按驻地。据嘉靖《常熟县志》记载,都宪行台时称“都察院”,明代凡都御史侍郎巡抚多即此以视事,原在儒学之西,后改迁县治西山巷之左;察院原在县治东数步,后迁于“都察院”西旧公馆地,其規制亦同<sup>⑧</sup>。崇祯时期,两署地址也未发生变化<sup>⑨</sup>。正因如此,对于当地有诉求的百姓而言,直接向两院或兵备道衙门呈告并非难事。但这也导致原

①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77-578页。

② 铺户指城镇中设肆开店者,有别于长途贩运买卖的行商。出于官府科索物资的需要,明代将各色行业的铺户注籍编行,即为铺行。相关研究包括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赵毅:《铺户、商役与明代城市经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黄敬斌:《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胡海峰:《徭役与城市控制:明代北京“铺户”内涵再探》,《学术研究》2014年第11期。

③ 黄敬斌:《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第109-112页。

④ Richard Lufrano, *Cherishing the People and Enriching the Dynasty: Officials and Non-Elite Petitioners in Late Ming Jiangnan*, *Ming Studies*, 2013:68,33-56.

⑤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⑥ 吴艳红,姜永琳:《明朝法律》,南京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

⑦ 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第132-141页。

⑧ [明]邓肇陂:嘉靖《常熟县志》卷四《公宇志》,第452-453页。

⑨ [明]龚立本:崇祯《常熟县志》卷四《公宇志》,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十二年钞本,第8-9页。



本完全可以由县官自理的事项,变成由“抚按明文”直接决策,负责执行的县衙也不得不尽快落实上级指示。从垦荒碑的实际效果来看,抚按等衙的参与确实有助于垦荒政策在地方层面顺利推行,又依托于碑石材质的“垂久”,甚至到清代异乡甲制度仍被看作“旧德”而重新认证。这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自然也会不断地在周边地区、类似场景中重复使用。得以印证的是,明中后期各地以“抚按明文”为碑额者众多,但实际上大多是以县衙名义发布刻立的、列有抚按批示的公文碑<sup>①</sup>。

## 结 语

招徕垦荒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府应对积荒税逋的常见政策。不同于典章奏议所载优恤明文,常熟县刻立的三通垦荒碑则更加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政策受众群体——异乡垦荒业户面临的困境与应对策略。在邻县“嘉定事例”的影响下,常熟垦荒百姓也纷纷向地方上级官府告求优免政策,并以载明权益内容的公文勒石为证。在此情境中,“勒石”不仅仅是县衙负责落实的具体指令,也象征着围绕立碑行为展开的官民互动关系。而碑石之所以能够刻立长存,其支撑力源自地方官府与民间力量对于“勒石治理”模式的共同认可,这种模式的基础并非朝夕形成,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切磋协商,并经由实践反复检验所得出的较优解。

在此背景下,碑刻在地方治理中的功能也变得更加多元复杂。首先,作为传播媒介,县衙以公文形式立碑本身便是一种建构秩序的方式,通过在通衢或是衙门公示晓谕的手段,展示公权力介入的场景,以期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约束。同时,碑文所列抚按、兵备等衙门的批详,突出上司官员、监察系统对基层事务的参与程度,有利于受众信服程度的提高。其次,作为权益凭证,碑石的物质属性决定其更注重稳定性与持久性,这受制于权益申报主体的心理预期。不同于一般用途的纸本收执,往往是身处不利局面的群体寄希望于石刻介质的坚固,在保证权益内容难以更改的情况下,又能对周遭环境产生震慑影响,以此保障其权益的安全。第三,作为规则模式,经由申请者勒石立碑的程序,实现了由个人收执到社会公示层面的变化,由此便可突破空间限制,进而辐射到具备相似状况的周边地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能引发相当范围的模仿与复制,进而完成该领域新一轮的秩序更新。

(责任编辑:李良木)

~~~~~  
(上接第102页)

优于小农场抑或者是小农场优于大农场。具体来说,从保障粮食安全供给的角度出发,小农场相对于大农场在土地生产率方面享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也比较符合我国特有的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但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农业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大农场在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方面享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地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战略,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城市化还未完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较多,但未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下,在城乡就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下,我国最终还是会走向大农场的发展战略,这也是未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胡文亮)

<sup>①</sup> 李雪梅:《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叙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00-252页。